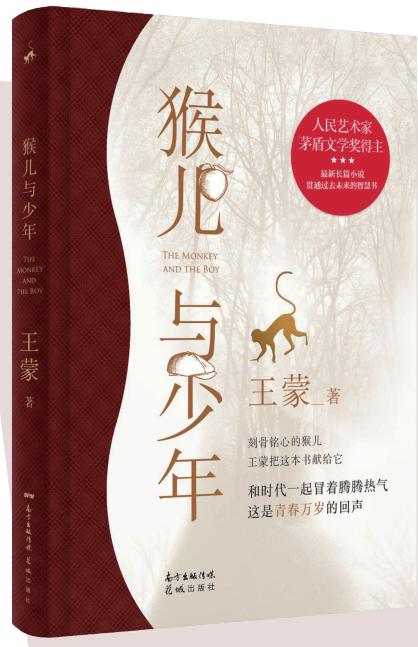


■新作聚焦 王蒙长篇小说《猴儿与少年》:

1958·猴儿与魔术师

□温奉桥



《猴儿与少年》呈现出一种繁华褪尽、水落石出的简约,这不仅仅是艺术技巧或艺术修养问题,本质是理解和处理历史经验的理念和范式问题。《猴儿与少年》完成了小说对哲学和抽象性的致敬。

王蒙就像一位文坛魔术师,总是带给你出乎意料的惊喜。

读毕《猴儿与少年》,耳旁无端回响起了芭芭拉·史翠珊(The Way We Were)的旋律:“记忆点亮了心灵的一角,那水彩画般的朦胧的回忆,令我想起了往日的情怀”。无端还是有端?

小说在一定意义是形象的哲学,事实上,通过小说探索存在之谜、命运之谜、人生之谜,构成了王蒙近年小说创作的独特魅力。岁月、青春、时代,得与失、通与塞、是与非、命运与因果、幸运与遗憾,谁又能说得清?说不清,故有趣、有味,故有了小说《猴儿与少年》。

其实,对王蒙而言,所有的“往日”并未走远,就如《猴儿与少年》中反复强调的那样,“1958”是王蒙的一个“情意结”,是其命运的一个“关键情节”,这一年,王蒙下放京郊门头沟桑峪大队“劳动改造”,这段经历客观上极大地拓展了王蒙的文学视野和文学想象。在经过了生命的山山水水之后,面对“1958”,耄耋之年的王蒙仍念兹在兹,思之梦之,仍有新的激情与想象,新的思考和发现。

熟悉王蒙创作的人都知道,主人公施炳炎在大核桃树峪村修路、背篓、挖渠、造林等劳动经历,在《失态的季节》《半生多事》中已皆有涉及,但经过时间的汰洗和沉淀,《猴儿与少年》发酵成了“陈年茅台的芳香”,那种“失态”的不平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悲壮和决绝都消失了,王蒙与命运和记忆达成了新的和解。和解是超越,更是一种新的历史观、生命观的达成,就如主人公施炳炎在其生命晚年,把当年“下放”农村看作是人生的“机遇”,把劳动“改造”说成是“狂欢嘉年华”一样。因此,《猴儿与少年》闪耀着一种走出了历史的沉重之后的浪漫与诗意。

浪漫与诗意,其实并非单纯时间的馈赠,更是生命阅历所沉淀的智慧、自信和从容。王蒙站在时间与经验铸就的人生高处,重新回望历史,回望“1958”,一方面依旧情思丰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如川逝浪波犹碧,似梦含羞情满怀”;另一方面,《猴儿与少年》又极大地突破了感性和经验世界的拘囿,是对经验和记忆的一次重铸和重新激活。显然,从王蒙创作的内在逻辑而言,《猴儿与少年》堪称其小说创作的一次全新超越,既超越了《青春万岁》的激昂,也超越了《活动变人形》的决绝,叙述中流露着王蒙特有的爱恋与亲近、幽默与从容。

我相信是“三少爷”点燃了王蒙的文学灵感,并引爆了情感深处的意念闪电。毫无疑问,猴儿“三少爷”是王蒙一个独具匠心的艺术创造,是神思妙悟,更是天启。不必讳言,王蒙的笔下有某种“猴气”存在,他智慧、灵变,他兴趣广泛,喜欢一切新鲜的事物与经验,反感一切拙笨、呆木和“死相”,这也许是猴儿“三少爷”这一文学形象的心理基础。“三少

爷”的活泼与机敏,精明与快乐,实为作者心目中某种理想人格的象征。至于它的恶作剧,以及愤恨已极后的“自缢”而死,都不寄寓了王蒙深爱的爱与怜惜、辛酸与遗憾。可以说,王蒙、施炳炎、少年侯长友与猴儿“三少爷”互为“镜像”、互为“自我”。猴儿“三少爷”是特殊年代的温暖与慰安,更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生命之光、灵性之光。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真正主人公也许并不是施炳炎,而是少年侯长友、猴儿“三少爷”。

少年也罢,猴儿也罢,其实王蒙在这部小说中真正思考的仍是时代和社会的大命题,这是王蒙小说的“宿命”。王蒙自少年时代即志向革命,“革命”既是王蒙的“童子功”,更是其创作的底色。《猴儿与少年》在对历史的抚摸和吟唱中,重返小说的庄严感。无论是少年侯长友还是猴儿“三少爷”,他们命运的迁徙流转,其实不过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历史的缩影。

对百年来中国社会现代性的书写反思,构成了王蒙近年小说创作的一种重要主题,《猴儿与少年》也同样如此。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时间,几乎所有的大事件在这部小说中都有或实或虚、或隐或显的表现,既流露着王蒙对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渴望与欢呼、留恋与珍惜,更表现了必有的付出、代价乃至牺牲,或许这才是这部小说的命意所在。那个花儿般聪慧、善良、真诚

的核桃少年,最后不得不住进了精神病医院,那双曾经清明闪亮的眼神,永远消失在了历史的烟尘中。猴儿哥的意外身亡,侯东平的含冤去世,猴儿“三少爷”的“自缢”而死,无不令人感到沉重与伤感、无奈与叹息。

然而,王蒙并未停留在历史的伤感与叹息中。《猴儿与少年》另一重要而容易被忽略的人物侯守堂,令人想起40年前王蒙的另一部小说《相见时难》中的蓝佩玉。特殊年代,作为地主少爷的侯守堂,带着军统特务的莫须有罪名连夜逃亡,最后不得不隐姓埋名,辗转去了N国。改革开放后,权大成(即侯守堂)成了中国与N国之间的友好使者,重返故乡,回报乡梓。在侯守堂身上,命运与历史、时代与沧桑,都达成了和解。在这部小说中,王蒙怀恋着也叹息着,超越了历史的单维度,体现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观。

这种崭新的历史意识,同样表现在小说的“减法”式写法上。《猴儿与少年》人物、故事、结构都很简单,单就篇幅而言,与其表现出的历史视野、思想意涵并不匹配,小说呈现出一种繁华褪尽、水落石出的简约,这不仅仅是艺术技巧或艺术修养问题,本质是理解和处理历史经验的理念和范式问题。《猴儿与少年》完成了小说对哲学和抽象性的致敬。

当代江苏文学城市书写的变奏

□李丹

■关注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城市文学逐渐成为当代文学创作重心和焦点,如果说“乡土——城市”的二元结构可以作为一个阐释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基本模型,那么明显的文学偏正形态正在加速生成。恰如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所显示的,数量超过9亿、占比超过63%的中国人居住在城镇,无论作为生存空间还是欲望对象,“城市”都已日趋内化于“文学”,而“城市性”也开始成为文学的“默认属性”。无论作为理解入口还是阐释基点,“城市”都已经变得难以动摇、显得难以取代。

作为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的省份,城市经验极大地孕育、滋养了江苏文学并重塑了江苏文学的面貌,前所未有的城市之“变”已经率先于江苏发生。而与这一巨变相伴生的江苏作家则天然地以其创作展现了这种变化,并在相当丰富的层次上以高度的敏锐和精确,描摹了城市之“变”的肌理。

边界感的普遍建立是城市文学的第一大特征。所谓城市之“变”,首先是指城市是一个巨型的“关系破坏机”,个体进入城市,就往往意味着原有社会关系的彻底解体和新的城市性社会关系的被迫重建,个体生存于城市,又往往不得不面对着深度关系建设的艰难和解构的轻易。百年前鲁迅对“乡土文学”命名、对其“侨寓性”的归纳,即是对这一现象的深刻认识。而在21世纪,“乡土——城市”之间的二元关系开始丧失重要性。当代的城市人口往往缺乏与乡土的血脉关系,他们是“城二代”或“城三代”,而“乡土”早已变成了一个模糊不清的背景。于是,不仅来自于乡土的原初社会关系遭到降解和重塑,城市内部的原生关系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无论作为记忆还是经验,个体生活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都在不断走高,而相对来说,宗族、家族甚至家庭的存在感则日渐走低。在城市生活经常意味着“一个人的队伍”和“一个人的战争”。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城市生活还紧密关联着乡村,两者间具有一种脐带性关系,而充任“脐带”的往往是家庭和家庭的拓展,那么当前的城市生活则意味着“只有归程,再无来处”,家庭的重要性被不断消解。江苏作家对此有着高度的触感和知觉,诉诸笔端的家庭故事往往深入肌理。

鲁敏在小说《或有故事曾经发生》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家庭——女儿与商业伙伴合租、离婚的父亲住在紫金山下的别墅、母亲生活在市中心的小区、一度亲近的奶奶躺在市里医院的康复科。当女儿米米选择自杀时,这些血亲无人能够说出哪怕一个接近于真实情况的理由。已经被城市生活犁过一遍或几遍的血缘再也无法承担亲密关系,这些幸存者反倒更加急切地要抓住任何一个并不十分靠得住的理由,以填补自己无计可施、无言可对的愧疚与空虚。室友、生意伙伴、性伴侣之类的关系,占据了城市生活者的绝大部分时间。鲁敏尖锐地写道:虽然米米与室友初音合伙“建了三十多个群”,“分头料理,在各个群搞气氛,给大家集赞投票打卡做运动做经验分享,再慢慢带货”,可谓戮力同心,但令人弄不清楚的是,“初音对米米之死,是极度伤心还是极度不伤心”,因为这两者的表现一模一样。无论在血亲还是非血亲之间,不可见而又坚固的边界已经建立,这种边界感极大地压抑和重塑了人的感情表达,深度的情感共鸣被排斥在外,以至于亲生母亲对米米的死,也是“偏就是哭不出来”。在鲁敏笔下,唯一热情关注米米死因的是一个靠自媒体文章为生的记者(也即是文中的“我”),因为“我”急需这个自杀素材写出文章以追求“稳赚不赔”。米米与“我”虽然阴阳相隔、北牡有别,却几乎是同一个人的两面,面对职场压力,“我”抱着“这次再干不好,我他妈就去死”的决心去追寻线索,也不过是一个未死的米米;米米在城市里独自挣扎求生,也不过是个死掉了的“我”。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镜映与照亮,却仍难以逾越彼此间的已成边界,更无法形成具有深度的共鸣,所谓“或有故事曾经发生”,意即这是一个被边界所限,既无法令人亲临现场,也无法让人归因叙述的故事。在这强烈的边界感之下,人与人又发展出各种传统观念所不能涵育的新型链接。同质的人生与坚硬的边界,有可能成为城市文学的主要内容。对这一现实的深切表达,显然是当代江苏作家深耕所在。

挤压感的形影相随是城市文学的第二大特征。城市不仅破坏原初关系,也整合和重塑人类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类既要高强度协作,又必须保持间距与行距,高密度的人口与高效率的日常使城市人都穿上了需索无度的刺甲,老板嘴上的工作量、打工人心中的工资单、所有人心下的碎碎念……都转换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KPI,人们彼此贴面飞行,所思所感却如与狼共舞。人与人之间不光有难以打破的边界,更有互相施与的巨大压力,彼此间就变成了“无法言说、难以相知、只能控剑”的关系。哪怕身处边缘,勿需与他人密切链接,这种“且行且珍惜,随时随分离”的关系也仍锚定于人的内心深处,使当代的人际关联呈现出别样的景观,江苏作家对此有着深切的体验与书写。不仅如此,江苏作家还进一步下沉,笔力从都市渗入县城,在县城书写中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在曹寇的小说《母亲》中,分手十年的女友之母骤然来访,在尴尬莫名的气氛中掠过主人公的生活。无论是在功败垂成的准岳母和准女婿之间,还是在家庭全须全羽的真岳母和真女婿之间,紧张关系都如出一辙。而小说结尾,主人公辗转缠绵而又蝇营狗苟的一个中篇的问题——当年前女友为什么决然和自己分手——终于被发射出来,却被前女友之母一语断然击落:“因为她不爱你啊”。于是,无所不在的挤压感和断崖式的空虚感在小说中一体两面,爆炸式地喷薄而出。作为一种更为庞大的城市空间,“县城”很少成为欲望对象,却又凝固着最丰富的“中国城市感”,“人间县城”中的诸种不堪与滑稽目前在文学中尚未得到充分开掘,尤其值得期待。而江苏作家在这一领域的努力,却已经初见模样,其先行意识不可谓不精到。

“县城”早已堪任当代故事的主要容器,更是诸种文学要素的重要反应釜。在江苏作家笔下的县城故事里,人间之上更有猛兽逡巡。黄孝阳的长篇小说《人间值得》创造了一个名为“张三”之物,一人兼容官家子弟、水泥商人、思想者和作家,更是“县城——省城”食物链的顶级捕食者,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类人“不是乡村秩序下的蛋,也不是都市文明的孩子……他们人至中年,现已多半在事实上成为县城政治经济文化各生态系统内的事人,是权力的毛细血管,亦是各种潜规则与隐秘秩序的制定者,谄熟不同的话语体系,自如切换,能在一个时辰内分别扮演富类与人类。”张三们的肉身在于“县城——省城”里横行无忌,如猛兽一样掠夺却也如所有的顶级掠食者一样无法避免富集效应,小说里张三的猎物之死和张三本人之死都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掠夺和反噬累为一体,挤压和承压合二为一的书写,构成了县城文学的主要内容,更有希望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内容。江苏作家的尝试和努力,于新的文学可能性的开掘贡献尤巨。

成年感的强制形塑是城市文学的第三大特征。城市形塑人一如乡土形塑人,而城市形塑的普遍特征大概可以用“成年”二字来概括。正如那句颇为流行的“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以及万能句式“你已经是个成熟的大人了,你应该……”基于“利弊”和“应该”的强迫性形塑,在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学中无所不在。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里宣称:“童年”只是印刷文化催生出来的社会学概念,而这一直被呵护珍视的概念会随着电视的出现而分崩离析不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叙事就奠基基于对无邪孩提的想象,或者说这一被判定为成人世界之外的物事其实一直支撑着成年人的世界,鲁迅“救救孩子”的振聋发聩大概可算是这种文学想象与实践第一推动力,而被斯诺看成是“鲁迅的法国版本”的伏尔泰则早有哲理小说《天真汉》,借野蛮人之口揶揄“文明的”城市人——“你们之间要防这个,防那个,可见你们都不是好人。”

而在当前的江苏文学创作中,“乡土——城市”“野蛮——文明”式的激烈对冲已经过去,文学的城市之“变”正体现为这一起源叙事的退场、城市主导性的建立以及人物成熟感的提升。富于乡村意味的意象逐渐退行为某种话语遗迹,只在叙事的边角处遮遮掩掩地存在,朱婧的《碧岩岩滴》收录2018年以来创作的13个故事,所写皆是“那些藏匿在都市标准化生活里的细小事,那些无法被命名和归置的情感和困顿”,其中《那只狗要去安徽》中的人物仿佛生下来已是完熟状态,“多数过着相似的生活,有界限的生活”,在城市里“读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也没有远离……读完大学之后……回到家附近,开了这家公司”,激烈的时空转移不复出现,文学角色则被牢固锚定于城市之中。而当城市变成唯一舞台,审视与控制、压抑与反抗又只发生在成年人之间,“分对错”的小孩子们在城市文学里已变得难有空间。

如果说以“城——乡”关系为主要议题的文学是具有某种先遣性的城市文学,在局部意义上解释了城市文学的意蕴,那么以城市为唯一重要当代的文学正在日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显然,在这一领域江苏作家已着先鞭。城市对人的定义正在呈现多种可能,这让我们有理由期待江苏文学城市书写的进一步发展。

(上接第2版《礼赞百年风华 谱写时代新篇》)

回望2021年中国与世界互动,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日、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还是上合、金砖、APEC、G20四大多边平台的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宣传思想战线坚持国家站位、全球视野,全方位、多角度向世界介绍中国经验、传递中国声音。

发出中国声音,既要讲好中国方案,又要敢于亮剑,立场坚定批驳谬误。

中宣部、国新办发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中国的民主》白皮书等文献,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一年来,针对美西方在涉疆、涉藏、涉港、涉台、涉疫情溯源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攻击抹黑,宣传思想战线旗帜鲜明阐明立场、针锋相对进行斗争,在众声喧哗的国际舆论场中,让中国声音更加清晰明确。

中国声音响彻全球,中国魅力惊艳世界。

治国理政的智慧启迪世界——

2021年11月17日,习近平重要著作上合组织国家语言文版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印地文、普什图文、达里文、僧伽罗文、乌兹别克文,第二卷乌兹别克文和《之江新语》《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俄文版等8种新书在推介会首发。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弗拉基米尔·伊马莫维奇·诺罗夫等外方嘉宾表示,从这些重要著作中,可以更好地读懂中国,了解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推进改革的宏伟规划,知悉中国的哲学、历史和文化,并有助于学习中国经验。

开放包容的态度温暖世界——

2021年11月,进博会又一次如约而至,拥抱八方来客。本届进博会共有58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参加国家展,来自1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家参展商亮相企业展。

岂止是进博会,从服贸会到广交会再到消博会,中国热情地向世界敞开了自家“客厅”,让世界感受到海纳百川的大国气象。

灿烂悠久的文化感染世界——

2021年9月,中国艺术家青铜组雕作品《神遇——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在希腊雅典揭幕,落成于其文化核心之地古市集遗址。

“古老的丝绸之路曾为我们示范了文明对话和合作共赢带来的辉煌,同时更向我们示范了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鉴未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望。”雕塑家吴为山说。

随着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更加坚实有力。

作为全球疫情下首个恢复线上线下结合办展的重要大型国际书展,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共吸引了105个国家和地区约2200家海内外参展商。“希望通过相关图书翻译出版,为大众读者提供更多了解中国的机会。”俄罗斯埃克斯摩出版集团代表伊娜说。

一个来自中国的好故事正在被国际社会熟识,开放而自信的中国在世界舞台绽放出别样光彩。

风好正是扬帆时,不得扬鞭自奋蹄。

踏上新征程,宣传思想战线担当作为、勇毅前行,不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精彩篇章。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记者王子铭、王鹏、高蕾、余俊杰)

■新作快评

王威廉中篇小说《你的目光》,《十月》2021年第6期

一篇具有茂盛生长力的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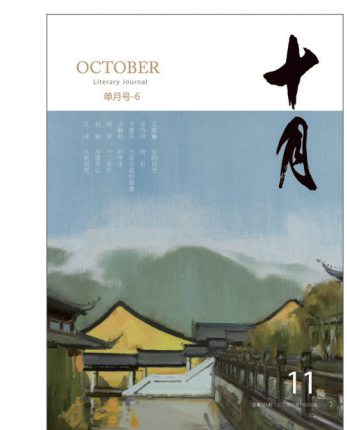
□徐 威

王威廉的中篇小说《你的目光》在六万余字的篇幅里,以深圳和广州为故事空间,以眼镜设计为纽带,讲述了眼镜店老板何志良与设计师沈姿淇的故事。

《你的目光》可以当作爱情小说来读。两个漂泊已久、遍体鳞伤的心灵,在浩大的时空中相遇、相知、相思、相拥取暖,并走向相守。他们各自拥有着一个并不圆满、并不幸福无忧的家庭,然而他们幸运地在相互理解与相互宽容中,得到了爱情的美好。这是一个温暖的爱情故事。王威廉没有在并不轻盈的现实中,再给我们呈现一个沉重的悲剧。它带着一种温度,一种慰藉,一种希望。

《你的目光》可以当作救赎故事来读。两个在漫长的岁月里背负着罪感的灵魂,相互试探,相互走进对方的领域,又相互拯救,最终走向超越。罪、死亡、苦难、失去,这些精神之痛,这些苦楚之物,是历史又是日常。有人选择遗忘,有人选择自我麻痹,也有人选择直视。直视并不容易,超越更为艰难。我们相信个体的超越力量,但更多时候,这个孤独的个体往往在遇见另一个与之相似的孤独个体时,这种自我救赎与相互救赎的力量才能最大限度地被激发出来。爱的力量超越人们的想象,人的力量也超越人们的想象。

《你的目光》可以当作哲学片段来读。生与死、看与被看、快与慢、大地与流水、坚守与探索、自我与他者、来路与归途、个体与时代、此刻与未来、科技与伦理……小说延续了王威廉一贯的哲学思辨,书写日常,但绝不限于日常。镶嵌在小说文本中的眼镜设计笔记尤其呈现出这一特征,它是诗,也是思。《你的目光》可以当作民俗笔记来



读。在跨步前行、飞速发展的粤港澳大湾区,那些穿越历史的传承,那些并未远去的过往,那些化整为零的族群,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而不是遗忘。客家与客家,一个远道而来,扎根大地;一个立于船头,不惧探索。它们平日里并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但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它们与广府、潮汕等一道构成了当下的广东形象。祖籍陕西的王威廉,久居广州,他写客家与客家,有点出乎意料,但又理所应当。当然,他也没忘在小说中勾勒一个来自陕西的妹夫陈春秋。

《你的目光》是一篇可以简化的小说。很多小说都是这样——概括起来,不过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励志故事,一个救赎故事。然而,我们总是并不满足于此。好的小说是可以简化的小说,更是能够生长的小说。它彰显出一种茂盛的生长力;故事结束了,故事又在结束的地方重新开始。《你的目光》是一篇具有茂盛生长力的小说,它是饱满的,是能够延伸出更多思考的。这并不容易。

“文学苏军”新观察 文艺报